

哈尔滨文史资料

第 八 辑

纪念哈尔滨解放四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张 梅 李述笑

编 辑：李兴昌 章 同

封面题字：张 屏

封面设计：栾国波

哈尔滨文史资料

第 八 辑

纪念哈尔滨解放四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875 字数：164,000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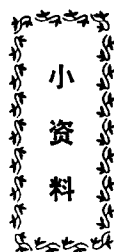
书号：黑出管字126号 定价：1.50元

目 录

革命 战斗 胜利

- 忆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代序）……………钟子云（1）
- 我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经过……………朱学范（24）
- 我在哈尔滨工作的前前后后……………刘 达（42）
- 三五九旅回师北上解放哈尔滨……………刘转连（76）
- 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的军工生产……………刘正栋（89）
- 我在哈尔滨经历的军工军需生产……………赵舒天（103）
- 回忆哈尔滨解放初期的卫生工作……………李亚非（112）
- 回顾哈尔滨普通教育工作的重大转变……………李曙森（119）
- 巩固城市根据地的哈尔滨公安武装……………曹延波口述
王习文整理（127）
- 哈尔滨工商界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金宗林（136）
- 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青年运动片断……………刘文成（147）

一束往事·····	郭霁云	(162)
在我和车向忱共同工作的日子里·····	何礼	(171)
在自来水厂工作片断的回顾·····	郭林军	(182)
恢复供电的战斗·····	王绍辉	(190)
记民生公司·····	刘以忠	(194)
接管鸡鸭公司生产军需产品·····	王桂华 韩延秋	(199)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	王树清	(205)



小资料

有关苏联对日作战之中苏协定·····	(88)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	(126)
东北人民解放军·····	(146)
东北根据地·····	(181)
东北停战协议·····	(189)
东北行政委员会·····	(204)

革命 战斗 胜利

——忆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代序）

科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然而，她更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她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大城市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马骏、李大钊、瞿秋白，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曾关心并组织领导过这里的革命斗争。在伪满统治期间，哈尔滨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堡垒，英雄的哈尔滨人民曾多次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在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党，参加了革命，踏上了战斗的征途。今天，在哈尔滨解放四十周年之际，回顾我在哈尔滨的往事，不禁心潮起伏，激情满怀，故撰此文，献给英雄的哈尔滨人民，一道庆祝和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踏上革命的征途

我是河北东光县人，青少年时代受北伐革命军的影响，立下了投身中国革命的志向。一九二八年，听说东北有共产党，中东铁路有赤色俄国人，于是，为了寻求革命，我远离家乡，来到了

东北的哈尔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人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许多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示威，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武装。当时，我也参加了马占山部下在海伦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救国学生团，进行抗日斗争。不久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失败后，抗日救国学生团也解散了。我又在一九三二年初回到了哈尔滨。

一九三三年春，我考入了哈尔滨电业局所属的电工学校。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宿舍和电车厂的工人宿舍在一起，这样，我就和工人们接触多了起来，也认识了不少人。当时，共产党员王景侠、王知一、王治国、黄敏学等人都和我有联系。开始，我是个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团组织的活动。到夏天，我便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组织上派我到道里团区委工作，任委员，以后又担任团区委书记。张晓岩同志任组织委员，中东铁路传习所有一个小张在区委任宣传委员。团区委由团省委直接领导。道里区团区委领导的范围很大，包括道里、南岗，主要是电业局，还有三十六棚、烟厂、警察机关等。这些地方都有团的组织。此外，也有一些零散的团员，如洋车工人等。电业局团组织的负责人是王治国，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布置工作。我们的主要活动是撒传单、贴标语和举行飞行集会。如在道外五道街王麻子膏药铺门前就搞过飞行集会（这种行动在当时是不适当的，易于暴露组织给党造成损失）。在哈尔滨车站前的纪念碑上也写过“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大标语。当时，工会也是不公开的，人数很少，我们叫它“赤色工会”，如若被捕，无论是党员、团员还是工会会员，敌人统统按共产党员处理。一九三三年秋末，我于电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电业局电力科做外线工作（检查居民用电情况）。这个工作，对我做团的工作很有利，所以，我经常借工作之便到

洋车工人和贫苦市民家中去开展活动。我当时的真名叫“苏永泉”。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改行帝制，溥仪称“帝”，伪年号改为“康德”。为此，日伪政权在哈尔滨也大肆鼓噪，在霁虹桥下坎搭起了牌楼，主要街道上挂起了龙旗，贴上了标语和五花八门的宣传画。为了反对日伪的这一举动，中共满洲省委指示要采取行动，印了不少传单，到处散发。就在这天的夜里，电业局的党团组织遭到大破坏。

第二天早晨，我去电业局签到，在乘电车的路上，一个和我很熟悉的车掌告诉我：“电业局出事了，有许多人被抓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当电车开到哈尔滨火车站时就赶紧下车走了。这次敌人对电业局的大破坏，主要是窦成瑞叛变出卖的。其实，电业局党团组织的活动早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窦成瑞也是车掌，和王景侠同班，他被日伪机关收买后，当上了特务。他伪装进步，混入了赤色工会。由于我们当时执行“左”倾路线，注意隐蔽不够，谁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被窦成瑞摸得一清二楚。所以，这天敌人突然采取行动，进行了大逮捕，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基本上全部被捕，只有我和鲍巨魁（又名张兰生，后去抗联，战斗中牺牲）、兰友勤少数人因不住在机关宿舍而脱险。不久，满洲团省委也遭到敌人的破坏，团省委宣传部长杨波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团省委书记刘明夫。刘明夫被捕后也叛变了，由此又致使中共满洲省委也遭到大破坏。一九三四年四至五月间，敌人也下令通缉我，但当时我已离开了哈尔滨。

转战各地坚持斗争

我离开哈尔滨后，在中东铁路的东线一面坡至绥芬河一带工作，任团省委吉东局成员和穆稜县委书记。此外也担负国际交通的任务，通过铁路列车员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李春荣同志（哈尔滨电影机厂原党委书记）当时是列车员，也是团员，还有孙立文

等人。中东铁路沿线各车站都有我们的党团和工会组织。铁路上的党员、团员都是工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吉东局遭到敌人破坏后，吉东局的党团主要负责人，虽未被捕，但有的逃回家去，有的当时不在铁路沿线，故党团组织各项工作都由我和张林同志负责。张林同志是老共青团员，他当时在铁路上工作。我的活动地点主要是在一面坡、横道河子、磨刀石、牡丹江和绥芬河，也偶尔回哈尔滨。

一九三四年九月，组织上派我到东满抗联二军去工作。当时，我是以满洲团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巡视工作的。后来，又担任了中共汪清县委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五年底，组织上派我去苏联，改名“王友”。一九三八年回国。回国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和党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工作。我和东北有不解之缘。一九三九年春，党中央派我到晋察冀边区建立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东北的白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弄清当时抗联情况和搜集敌伪上层人员的情报。当时北平、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都有我们的秘密工作人员。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绍记、侄子张绍伟，他们都是在日本留学时发展进来的抗日工作秘密人员。现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孙平化同志也是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他的叔叔何治安是伪满中央银行理事，我们还发展了伪满洲国银行总裁的女儿等人。除东北各大城市都有我们的组织外，在北平、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敌伪组织中，都有我们的秘密工作人员。一九四四年，我在唐山附近的丰润县杨家铺被敌包围的战斗中负重伤，一九四五年复返延安。

八·一五前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八月十日，八路军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配

合苏军作战的第一号命令。八月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布命令，命令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武装部队迅速向东北推进。同日，蒋介石也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方面要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一方面却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根据这一方针，在我军进军东北的同时，党就派出了一大批干部随各路大军开赴东北。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十八日，苏联空、海、陆军陆续进占哈尔滨，成立了苏军卫戍司令部，对哈尔滨实行了全面的军事管制。不久，苏军任命了滨江省省长谢雨琴、副省长李兆麟、哈尔滨市市长张廷阁等。这是在苏军军事管制下，对苏军卫戍司令部起辅助作用的政权。

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面急速向东北大量运送军队，抢占大中城市；一面派遣大批特务人员来哈尔滨进行秘密活动，收罗日伪残余，封官加委，形成“蒋伪”合流，企图占据哈尔滨。其中，刘友廉、陈光组建了“国民党哈尔滨党务专员办事处”，搜集各方面情报；谭学融、李芳春成立了“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极力发展组织；左文举、杨季青拼凑了“三青团筹备处”，培训骨干；张勃生建立了“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特务组”；赵万里组织了“爱国除奸团”，策动叛乱，暗杀我党政干部；还有一些国民党的要员四处网罗土匪和日伪残渣余孽，组织起了形形色色的杂牌军。这些国民党反动分子和特务，利用哈尔滨人民惨遭日伪十四年血腥统治而急于求得安定的心理和对苏军少数违法乱纪现象不满的情绪，大肆宣传反苏反共思想扰乱人心，与我

党争夺群众。

此时，我党在哈尔滨虽然尚未有正式领导机关，但仍有一批从敌人监狱放出来的，或由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秘密派出来的共产党员继续坚持斗争。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开展党的工作。随苏军首先进入哈尔滨的抗联的同志，协助苏军接收了日伪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机关以及各类仓库、财产和物资等。如刘亚楼同志随同苏军政治部人员，于八月二十日接管了伪哈尔滨放送局，并改名为“哈尔滨广播电台”，从此，将广播宣传工具置于我党的领导之下。八月二十三日，抗联将领李兆麟同志领导成立了“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与此同时，原先由各抗日根据地派来哈尔滨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与狱中获释的革命者约三十人，在“东光寮”（原日特公寓）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有张观、周维斌、李光复、王景侠、张罗等。他们先后组织了“塞北风”、“旭光”两个话剧团，演出了曹禺等革命作家的优秀剧目，宣传革命思想，在庆祝“九·三”胜利的大会上，公开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群众介绍坚持八年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雄业绩，派出严冲、林忠良、陶英邦等人到榆树、平房、阿城和下江一带组织武装，为防范土匪、保护群众秋收，临时组建了一支“吉黑人民秋收自卫队”，由邓昶任司令员、陈飞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在当时抵御了土匪的肆意掠夺，还在哈尔滨开办训练班，发展了二百多名共产党员。九月下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张观、周维斌在苏军司令部的协助下，乘苏联军用列车抵达沈阳，面见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陈云同志代表东北局作了四点指示，即：“接收政权，建立武装，发动群众，收集敌伪物资”。十月一日，张观、周维斌同志返回哈尔滨，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在李兆麟同志领导下开展了工作。“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扩大党的

影响，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收集敌伪物资，抵制国民党的影响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党正式领导机关来哈尔滨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起了积极的作用。

重返哈尔滨开辟工作

“八·一五”以后，党中央高瞻远瞩，在对全国的形势和东北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战略地位进行了全面、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及时将“向南发展，向北防御”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迅速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英明决策，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部署。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罗荣桓、李富春、林彪等组成，彭真为书记。九月十九日，党中央发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党内指示电后，延安总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等都将派出南下工作队的一大批干部调头北上。在这种情况下，九月下旬，刘少奇同志找我和陈郁、孔原三人谈话，叫我们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去东北，先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我们由延安出发先到张家口，十月初到达沈阳。这时，彭真、陈云等同志已乘飞机先期抵达了沈阳。我们三人中，陈郁、孔原留在沈阳的东北局工作，我被派往哈尔滨。

十月中旬，我和王建中、李桂森等二十余人到了哈尔滨。我到哈尔滨后，同李兆麟同志取得了联系，然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撤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李兆麟、张观、周维斌、张罗等为委员。

中共滨江地区工委成立之后，首先着手建立党的武装。十月十四日，由李兆麟同志出面，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宣布成立哈尔滨市保安总队。总队部设在原伪满第四军管区司令部址，王建中任总队长，我兼任政委，刘铁南任政治部主任。保安总队以原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组织的“吉黑人民秋收自卫队”为基础，经整顿后，对其中四百多名旧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和失业工人进行了集训，王建中同志向他们宣讲了我军的纪律、作风和战术。然后，我们又不断地扩充了军队，使保安总队很快发展到三千五百多人。这是我们初到哈尔滨时，在既无我们老的部队，又缺干部的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建军方法。不久，关内陆续来了一批干部共四百多人。他们到哈尔滨后，大部分被派到各县发展武装，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其中，有四十多名连、营级干部充实到市保安队，成为我党在部队中的骨干力量。此时，保安总队改由刘子奇任总队长，王建中任政委，齐渭川任政治部主任，吕天任参谋长。由于各方面的工作，保安总队很快发展到五千多人，分设五个大队每队约一千人左右，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我们还组织接收了哈尔滨周围十四个县的政权，成立了哈东、哈西、哈南、哈北四个专署和党的地区委员会。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和李兆麟同志召集何延川、罗星、胡起、陈士清、王景侠等同志在滨江医院开会，任命了何延川为哈东专署办事处主任、王景侠为地委书记。同时，还任命了一些县的负责人，并要求他们速到工作岗位，抓紧扩军，注意收集物资和准备战士冬衣。以后，又相继在这几个地区建立了军分区。

在建立党的武装和一些地、县民主政权的同时，还开展了宣传群众的工作。十月二十五日，中共滨江地区工委发布了《告全体同胞书》，公开向哈尔滨地区各阶层人民表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坚决没收敌伪财产，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号召“工、农群众及知识分子起来参加政权、军队”；要求“知识分子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材为人民服务”；鼓励“妇女要积极组织起来，求得解放”；宣布“对贫苦的青年、儿童适当救济，使其就学”。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陈云等同志来哈尔滨组成了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同时，撤销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松江省军区”、“中共哈尔滨市委”。张秀山任省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兼省军区副政委和哈尔滨市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是聂鹤亭。李兆麟同志是北满分局委员，也是市委委员。市委副书记是何伟（后来的）、杨维，成员还有毛诚、张观、周维斌等。

暂时撤离 乌云密布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为履行它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通知我党、我军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退出哈尔滨，并要求我军不要在有苏军驻守的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准备将城市的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当时，我们的许多干部想不通。我从延安来时，少奇同志给我们讲过，要估计到形势的变化，要和苏联红军搞好关系。十一月二十日，苏军方面找我们谈话，竟下了“逐客令”，限二十三日撤出。我们与苏方交涉，据理力争，但毫无结果。根据当时的形势，也为了顾全大局，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委、省军区带领哈尔滨保安总队二、四大队约一千四百余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撤到了宾县。哈尔滨保安总队的另外三个大队约三千人，改编为三个团，经五站，到达“三肇”，司令部设在肇东县昌五镇的一座“道德会”院内。

不久，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部署内战，将伪满的“铁石部队”姜鹏飞部编为新编二十七军，由冀东空运到长春及其以北地区，作为向我们进攻的先遣部队。十二月，国民党“东北行营”征得苏军的同意，派关吉玉、杨绰庵等接收大员，

还有二百五十多名“铁石部队”人员，陆续从沈阳来到了哈尔滨。他们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接收了“松江省政府”（即原滨江省政府），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接收了哈尔滨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苏军手中。这些接收大员们接收政权之后，原形毕露，非但不干一点好事，更不顾人民的死活，从到哈尔滨的第一天起就争权夺利，分赃肥私，一心对付共产党。他们在哈尔滨秘密建立了地下军和特务组织，豢养了一批密探，专门干监视进步团体、制造谣言、进行暗杀，以及其他破坏活动等罪恶勾当。由于他们这些接收大员贪污腐化的恶劣行为，没过几天，群众就称他们为“二满洲”、“官胡子”。

在哈尔滨周围，国民党反动分子嚣张一时，更闹得乌烟瘴气。它们以伪国兵、伪警察和特务为骨干，收买惯匪、兵痞，拼凑起各种旗号的杂牌军，如曹兴武、祝安石的中央先遣军，关铁良的东北救国军第六路军，郭世禎的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刘立权的松江地区保安军，毋杰卿的抗八军和罗庆春的宣抚委员会等。一时间，哈尔滨附近是群魔乱舞、匪患遍地，对我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危害甚大。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特务大耍“先八路，后中央”的反革命阴谋，乘我扩军之机，打入我军内部，策动叛乱。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哈尔滨之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使北满地区乌云密布，狼烟四起。我们在各县组建的保安队有一部分先后发生叛变。当时，除宾县、呼兰、巴彦和双城四个县仍在我们控制之下外，其余县城保安队均发生叛变，一些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惨遭杀害。就是撤到宾县的部队，也有一个连叛变，打死了我们省军区的机要员和警卫排长，使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受到很大的威胁。撤到三肇地区的哈尔滨保安总队中，叛变的就有一千多人，占保安总队的五分之一，使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的宾县一度处于敌

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哈尔滨有一些人被一时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不清形势，又倾向了国民党一边。

然而，我们共产党人却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所吓倒，更没有在暂时的困难和不利的形势面前畏葸不前。在我党、我军领导机关和保安总队退出哈尔滨后，中共哈尔滨市委仍留驻哈尔滨市内，以“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作掩护，进行公开的活动，坚持斗争。当时的市委机关在南岗河沟街 一号的一个小二楼，李兆麟、毛诚等就在那里办公和居住。另外，大直街二十六号还有三个单元，作为我们住所。中共哈尔滨市委在这段时间里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体；建立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领导我党的秘密地下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运用我党创办和领导的《哈尔滨日报》以及《北光日报》，公开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不指名地（苏军限制公开点名）揭露美蒋反动政策及其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罪行。这一时期，我党在哈尔滨的公开代表李兆麟同志，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同国民党展开了政治斗争。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庆祝大会上，他当众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会场群情激昂，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声讨大会。国民党反动派对李兆麟同志如鲠在喉，多次进行恫吓。然而，李兆麟同志毫不畏惧。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实施了他们的蓄谋已久的罪恶计划，于三月九日将其杀害。这个不幸消息传出后，全城人民异常愤怒，自发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抗联的老战友冯仲云和我，及当时的机关主要负责人张观、周维斌等，还有当时社会有名望的谢雨琴、李国钧、马英林等也参加了送葬行列。强烈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实行白色恐怖的罪行。

撤离哈尔滨的同志们在北满分局的领导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精神，深入到各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农民武装，锄奸反霸，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在哈尔滨周围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四六年四月，为和国民党的松江省政府相对抗，争夺政权，遵照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委的决定，在宾县召开了松江省参议会，由参议会选举产生了松江省民主政府和省参议会，冯仲云为主席，杜光预先生为议长，统一领导松江省所属的十四个县。从而，彻底否定了国民党反动派“松江省政府”的合法地位。

“四·二八”进驻——哈尔滨解放

一九四六年四月，苏军即将由哈尔滨撤走。鉴于这种情况，四月二十三日，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请求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尔滨市，以维护哈市人民生命财产案》。二十四日，《北光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市”的社论。二十五日，即苏军全部撤走的前夕，我军已集结哈尔滨郊区，待命进城。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见大势已去，便随苏军撤到了苏境，后经海参崴绕道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四月二十八日，苏军刚刚撤完，我军便长驱直入哈尔滨市区。

我军正式进驻哈尔滨，受到了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哈尔滨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哈尔滨是驰名中外的大城市。“四·二八”进驻后，它成为我党有史以来在全国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当时解放区中唯一的大城市。因此，哈尔滨对我党、我军来说，从全国和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来看，无疑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战略地位的。

哈尔滨是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商业发

达，而且还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它的东、西、南、北都是我们的根据地，以它为中心可以把我们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以它为依托可以使我们的民用、军需物资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得到保证。因此，它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北满根据地，还是在军事上调动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哈尔滨的解放，成为我党、我军强大的标志，它使人们看到了全国胜利的希望和曙光，对北满、西满、东满等各根据地广大军民和前线将士在精神上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由于哈尔滨在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肩负着建设后方根据地，支援前线的历史重任，所以，“四·二八”进驻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北满军区 and 松江省的党、政、军各机关立即回到哈尔滨。六、七月间，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也全部进驻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也在这里成立。于是，哈尔滨成了我党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和重要的战略后方。为了适应哈尔滨这种特殊战略地位的需要，将它改称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市”。

正因为哈尔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蒋介石反动派要千方百计把它抢到手。在国共两方的军事谈判中，他们一再无理要求我党我军退出哈尔滨，并以此作为停战的条件。我党我军以撤出四平、长春作为适当让步的实际行动后，他们仍不罢休，蠢蠢欲动，准备进犯哈尔滨，还叫嚣打进哈尔滨过春节。然而，我党我军没有轻易把哈尔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虽然是敌强我弱，尽管我们也做了撤退的准备，但我们看到了保住哈尔滨的可能，并为此做了努力，进行了斗争。哈尔滨东、西、北三面是我军控制下的广大农村和中